

谋略纵横系列

# 管子 谋略

朱少华 编著

## 王世经纶

肩子



YZL10890166649

管仲认为，作为君王，要使国家得到治理，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又必须先使民众富裕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先予雁取」智谋。根据齐国的社会特点，管仲又指出，富民之道最根本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围绕发展农业，他提出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诸如「均地分力」、「无夺民时」、「相地而衰征」，等等。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ress

謀略  
縱橫  
系列

# 匡世經綸 謀略



肩子



朱少華  
編著



YZL10890155649



蓝天出版社  
Blue Sk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匡世经纶：管子谋略/朱少华编著. - 北京：蓝天出版社，2011. 12

(谋略纵横系列)

ISBN 978 - 7 - 5094 - 0641 - 0

I . ①匡… II . ①朱… III . ①管仲(？～前 645)  
- 哲学思想 IV . ①B22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058 号

## 匡世经纶：管子谋略

出版发行：蓝天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14 号

邮 编：100843

电 话：010 - 66983784(编辑) 66983715(发行)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 本：16 开(710×1000 毫米)

字 数：211 千字

印 张：15.7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管子，是人们对我国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管仲的尊称。管仲，名夷吾，春秋时吴楚交界地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大约生于公元前725年，卒于公元前645年。

管仲属于姬姓的后代，其父名管严，曾在楚国做过官，后战死疆场。叔叔名管至父，在齐国为官。管仲少年时家境贫困，父亲死后，母子相依为命，为此，他经过商，当过兵，并同鲍叔牙结为好友。

春秋初年，齐襄公荒淫无道，他的弟弟们都认为他一定没有好下场，纷纷逃离齐国。二弟公子纠由管仲、召忽辅佐奔往鲁国，三弟小白在鲍叔牙的辅佐下奔往莒国。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被杀，大夫高傒乃召在莒国的小白回齐继位。这时，鲁国也听到了襄公的死讯，派兵送公子纠回齐抢班，并由管仲先率兵击堵住小白的归路。管仲截住了小白，一箭射在小白的玉带钩上，小白装死，骗过了管仲，导致公子纠放慢了行程。而小白已先期入齐登基，是为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后，虽然念念不忘管仲的一箭之仇，但为了图霸，用人心切，终于采纳鲍叔牙的意见，从鲁国把管仲接了回来，任命为相国。管仲辅佐齐桓公达40年之久，对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齐桓公曾尊称其为“仲父”。

管仲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谋略家。他曾提出过许多富有启蒙性的思想，建设齐国的军事力量和指挥对外作战，并在治国、牧民、御人、外交、处世等方面，积累了一系列智谋韬略。这些智谋韬略，主要见诸《管

子》一书之中。

《管子》一书的主要篇章是由管仲自著的，也有一部分是管子后学整理管仲的思想、事迹或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而成。其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及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所以，它历来在古代诸子百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凡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及思想史的人，《管子》是一部非读不可的典籍。我们研究管仲的智谋韬略，也必须以《管子》为基本依据。

《管子》书中的谋略思想十分丰富，并且在许多方面有独创的见地，是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的一朵灿烂奇葩。尽管其中有一些是管子后学的加工，但我们认为，全部用管仲的名字来命名，是当之无愧的。可惜我国学界对这一谋略之花的研究并不充分。管子的谋略思想，不仅包含在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思想里面，而且还体现在他治理齐国的一些具体事件之中。本书主要依据赵守正先生译注的《管子》，兼参考《史记》、《左传》、《吕氏春秋》等历史文献，从定国、理政、用人、外交、人生五个方面，阐发和介绍管子智谋，以期对管子的谋略思想有一个整体的描述。每篇所引证的范例，既可以说是对管子谋略思想的形象化解释，又可以看做是如何运用这一谋略的具体案例。

本书对管子谋略思想的研究，还只是一种尝试。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再加上体例的原因，研究还十分粗浅。但是，我们想，这蹒跚的起步，毕竟为管子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书中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 目 录

## 一、定国智谋

1. 举大事，必从其本	( 3 )
2. 治国先富民	( 6 )
3. 欲取之，先予之	( 9 )
4. 以农为本	( 13 )
5. 务在四时，守在仓廩	( 16 )
6. 相壤定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18 )
7. 用非有，使非人	( 21 )
8. 藏富于民	( 25 )
9. 施普惠，致天下之民	( 26 )
10. 得人之道，教之以政	( 29 )
11. 效法先王，“游”、“夕”为民	( 31 )
12. 作内政而寓军令	( 34 )
13. “四民”分业而居——分而治之	( 36 )
14. 君操“决”、“塞”	( 39 )
15. 盐铁专卖“官山海”	( 42 )
16. 牵之以利，圜之以害	( 45 )
17. 平准价格，调通民利	( 48 )
18. 以重藏轻	( 51 )
19. 散囤积，调余缺	( 54 )



20. 乘时进退	( 57 )
21. “九惠之教”以安民	( 60 )
22. 备患于未形	( 62 )

## 二、理政智谋

23. 兴举德政	( 67 )
24. 张“四维”以行君令	( 70 )
25. 集天下之心虑之	( 73 )
26. 慈爱百姓，厚施德惠	( 74 )
27. 德行训练，以小为始	( 77 )
28. 政教相似而殊方	( 80 )
29. 法以立朝御民	( 83 )
30. 动无非法	( 86 )
31. 国之重器，莫重于令	( 90 )
32. 以法行法	( 92 )
33. 不淫意于法之外	( 95 )
34. 法藏于官，成俗于国	( 98 )
35. 治莫贵于得齐	( 100 )
36. 威不二措，政不二门	( 103 )
37. 势非所以予人	( 106 )
38. 三官不谬，五教不乱，九章著明	( 109 )
39. 赏足劝，罚足畏	( 112 )
40. 君主以自正服天下	( 115 )
41. 俭财用，禁侈泰	( 118 )
42. 节宫室，适车舆，去玩好	( 121 )
43. “中道”为用	( 124 )
44. 珍惜国力，重尽其民力	( 126 )



45.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129)
46. 不贪于土，不竞于兵	(132)
47. 重调查，每事问	(135)
48. 交纳兵器赎罪——通权达变	(138)

### 三、用人智谋

49. 谋百年大计，种百获之树	(143)
50. 广招贤人，嘉美礼之	(146)
51. 用人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	(149)
52. 各顺其序，各司其职	(152)
53. 察能而授官	(155)
54. 重德才，轻资历	(158)
55. 用人所长，避其所短	(161)
56. 以其所绩者饲之	(164)
57. 使法择人量功	(166)
58. 厄其道而薄其所予	(169)
59. 严吏制，重监察	(172)

### 四、外交智谋

60. 尊天子以收买人心	(177)
61. 等列诸侯，待时图霸	(179)
62. 恩威并举	(183)
63. 挟天子以令诸侯	(186)
64. 至善不战	(189)
65. 近则用实，远则施号	(192)
66. 释实而攻虚	(195)
67. 实而虚之	(199)



68. 用兵之势在明于机数 ..... (202)  
69. 经乎不知，发乎不意 ..... (205)  
70. 谋攻莫过巧离间 ..... (208)

## 五、人生智谋

71. 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 ..... (213)  
72. 思中以为纪 ..... (216)  
73. 抱虚守静 ..... (218)  
74. 毒而无怒，怨而无言 ..... (221)  
75. 成功之道，羸缩为宝 ..... (224)  
76. 死者成行，生者成名 ..... (227)  
77. 事生于虑，成于务 ..... (230)  
78. 重大节 ..... (233)  
79. 道之用也，贵其重也 ..... (236)  
80. 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 (239)

## 一、定国智谋

齐桓公登位后，面对襄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首先需要的是安邦定国的良策良谋。据说，管仲回到齐国后，齐桓公三沐三熏，以极隆重的礼仪与其相见，俩人促膝交谈了三天三夜。管仲从“以人为本”、“以百姓为天”的社会政治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安邦定国谋略。

管仲认为，作为君王，要使国家得到治理，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又必须先使民众富裕起来，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先予雁取”智谋。根据齐国的社会特点，管仲又指出，富民之道最根本的在于发展农业生产。围绕发展农业，他提出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诸如“均地分力”、“无夺民时”、“相地而衰征”，等等。

为了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管仲提出“君操‘决’、‘塞’”，并实行了“官山海”、“平准”等举措。尤其是他推行的“轻重术”，在我国古代经济谋略思想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此外，为了得民心，管仲还主张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爱惜国力、民力。还不时推出一些收买民心的小策略。





## 1. 举大事，必从其本

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岱之率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

《管子·霸形》

桓公与管仲等人讨论治国之道。管仲对桓公说，君王如果想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就必须从最根本的事情做起。桓公问管仲什么是最根本的。管仲回答说，齐国的百姓，就是您的根本。百姓很担心饥饿，而国家却税收很重；百姓很恐惧处死，而国家却刑政严酷；百姓很害怕劳顿，而国君兴举政事却没有时限。您如果能够轻征赋税，则百姓会不担心饥饿；如果宽缓刑政，则百姓就会不恐惧死罪；如果兴举政事注意时限，则百姓就不会害怕劳顿了。桓公听后说，我现在算是懂得了治理国家的道理了。

“举大事，必从其本”智谋，是管仲“民本”韬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基础，也是君王统治的对象和根基。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要得民心，就必须爱民。与民休息，使民众免于饥饿、恐惧、劳顿，就是最大的爱民。正因为如此，一些有成就的帝王和现代国家领导人，都把与民休息、“从其本事”作为重要的治国策略。

楚国有个叫芈叔的地方官，他征收的赋税往往比别的官多，楚王对此非常高兴，在朝廷上赞誉他。孙叔敖见状仰天大笑。楚王不高兴地说：“令尹看到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为什么不直接指出来，却在朝廷上羞辱我？”孙叔敖没有正面回答楚王，而是先给楚王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家乡有一个靠洼池而得利的人。一天，有个吴人路过池边，见洼池里有很多鱼鳖，就对我的乡人说，我善于捕鱼。我的乡人听后很高兴，就给他准备了渔网、舟楫，资助他去捕鱼。可那吴人却跑到洼池边，说，



我在这里捕鱼。乡人皱起眉头说，我还以为你能捕获江湖里的鱼来为我增加收益呢，如果在这里捕鱼，那么，我本来就拥有这些鱼，还用得上你捕吗？”讲到这里，孙叔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如今楚国的百姓都是你的臣民，芈叔作为地方官吏，没有用善政来安抚百姓，却从君王所固有的赋税中多加索取，来显示他的政绩，这样做，实际上是剥下君王你腿上的肉给君王吃啊。如果所有官吏都效法他，那国家也就危险了。”



的关卡只查询，不向过往者征捐，市场上也只定契书而不课税。这些政策实行了几年后，民众对齐王就像江河归附大海一样地归附他。

民为国之本。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大战略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就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举大事，必从其本”的智谋，特别是“广积粮”战略，可以说是智谋的范本。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是军队的基本给养。维持战争需要粮草，进行大规模的、持久的战争，更需要大量充足的粮草。朱元璋回巡的江淮一带，虽然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但是，元朝末年，江淮一带十年九荒，民不聊生。昔日的粮仓变成了缺粮的空仓，许多百姓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更谈不上拿粮食供给朱元璋了。

当时，朱元璋曾经下过通令：“凡入敌境，听从捎粮。”所谓捎粮，就是说军队的粮草要取之于民，由百姓供给。然而，战火纷乱，青壮年都参军打仗去了，农村劳动力缺乏，严重地影响着农作物的耕作。再加上战乱的侵扰，粮食生产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产量连年下降。更何况起义军在新占领的地区立足未稳，民众情绪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征集粮草，十分困难。朱元璋手下的大将胡大海和常遇春对此早有感觉，并先后提出意见，认为一味靠捎粮，老百姓受不了，军队自身也难以维持。

朱元璋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当初他提出“捎粮”，是在于使军队的粮草取之于

楚王觉得孙叔敖讲得有理，便罢免了芈叔，还下令诏示全国：各地官吏，若有效法芈叔那样盘剥我百姓而征收赋税最多的，必处大刑。楚人听到这一诏令，非常高兴，勤奋生产，三年时间就使楚国称霸于诸侯。

管仲的“从其本事”、与民休养生息谋略，在实施过程中，也主要体现在减轻民众负担上。当时齐桓公发布公告，规定纳税者只要出百分之一的税款，孤幼的人不处刑罚，水泽按时开放，各地



民。然而，这个“取”，只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老百姓并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让他“取”。所以，这种“取”，从一定意义上说，有点“榨取”的味道，并且，随着老百姓生活困难程度的加深，这种“榨取”的味道就会更浓。朱元璋心里清楚，百姓是他的根基，他就是在百姓们不满元朝统治的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才得以揭竿而起、一呼万应的。如果现在在军队粮草问题上处理不好与民众的关系，就有可能失掉百姓这一根基，使首义大事夭折。

因此，可以这样说，朱元璋实行“广积粮”战略，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征集粮秣。他一方面广开生产粮食的途径，建立了且战且耕制度；另一方面，又给百姓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减免农民纳粮的负担。朱元璋任命元朝的降将康茂才担任都水营田使，由他负责兴修水利，要求达到高地不怕旱、洼地不怕涝。接着，朱元璋又下令各部队都要在驻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并且定出章程，规定以产量的多少来实施赏罚，还要求各部队除了供给自身的粮草需要外，必须有存粮。同时，朱元璋又在地方设立管领民兵的万户府，主要职责是将民间的部分壮丁编为民兵，农时耕种，闲时练兵。于是，从军队到地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且战且耕制度产生了显著收效。实行的当年，康茂才所部就生产粮食1.5万石，余粮7000石。朱元璋非常高兴，立即下令褒奖。同时谕令全军，指出，要解决粮食不足的困难，强兵足食，还必须做好屯田工作。几年之内，朱元璋所属各部到处兴屯，粮食丰收，保障了部队的自给自足。

在军队自己生产粮食的同时，朱元璋还逐步减轻农民的纳粮负担。1360年5月，朱元璋下令禁止征收寨粮。至此，曾经给百姓带来严重负担的捎粮政策完全被取消，百姓欢欣鼓舞，更加支持和信赖朱元璋及其领导的部队，纷纷向其部队输送兵员。同时，民众免除了“捎粮”之苦，有了充足的粮食，生活有了保障，进而迸发出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为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广积粮”战略的实行，使朱元璋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缺少粮草的窘境，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使他得到了民心归顺这一取得胜利的根本依靠。



齐桓公对管仲说：“我听说，一个国家的富强，关键在于经济；一个国家的安危，关键在于政治。现在齐国的经济状况很好，但政治上却很薄弱。如果想使齐国强大，就必须加强政治建设。”管仲回答说：“君王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同时还要注意商业的发展。只有这样，齐国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 2. 治国先富民

管仲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相地而衰征”。这项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产量来征收赋税，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他还主张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鼓励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子·治国》

管子说：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民众富起来。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这里面的缘故是什么呢？原来，人们富裕就会安居乐业，并且爱惜家园，人们安乡爱家就会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罚，而人们敬上畏罪也就容易治理了。相反，人们贫穷就会不安于乡居、勤于职业，并且轻视家园，而不安于乡居、轻视家园的人，就敢于对抗君上、违犯禁令，当人们抗上犯禁时也就难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足的国家，而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治国先富民”实际是管仲“民本”思想的组成部分。在管仲归齐之初，齐桓公曾经同他一起讨论建立霸业的大计，当桓公谈到想乘此诸侯之间没有战事的机会稍微加强一下军备时，管仲回答说：“不行。眼下百姓生活困难，您应当先爱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国家尚未安定，而您却不首先顾人民，去先搞军备，其结果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在管仲看来，只有先使民众富裕起来，才能实现内使百姓顺从、外使诸侯归附的宏图。

的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富裕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和象征。管子的“治国先富民”智谋，看到并抓住了民众这一国家的基础，通过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来牢固国家的根基，治安图霸。

在古代社会中，人民虽然处在无权的被统治地位，但是，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如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指出：“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民众如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汉代贾谊则进一步提出“为政以民为本”，并认为，“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最基本的就是要使民众有吃有穿，安居乐土。就像管仲说的那样：“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节。”如果统治者见利而忘民，那么，必然导致民穷而国危。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富民”政策作为治国的首选策略。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的创建者成吉思汗的孙子。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族所建立的大蒙古国，是以游牧为基础的军事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游牧经济的特点，是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而军事奴隶主贵族又具有惊人的掠夺性，他们往往不是靠扩大生产来增长社会财富，而是靠向周围邻近的部落、民族发动战争掠取财富。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1218年灭西辽，到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小朝廷于崖山后统一全国，蒙古军事奴隶主贵族集团所发动的征服战争持续了70多年，其间他们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以及变俘虏为奴隶的政策，严重地破坏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在忽必烈建立大元之时，中国先进的封建制度濒临破灭的边缘，整个社会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如何治理国家？这是忽必烈即汗位的前前后后一段时间内一直思索着的重大问题。即位之前，忽必烈先后招聘王鹗、张德辉等四方学者谋士，听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讨论儒教等文化在汉族封建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祖皇帝，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辏，争进所闻。”这是其臣子对当时盛况的追述。1260年春即位后，一套新的治国之策便在忽必烈的心中酝酿成熟。他决定以安定民生、使民富裕为基点，进行一场“变通祖述、加强文治”的改革。就像“民本”思想有许多组织部分一样，“治国先富民”智谋也需要一系列具体举措来支持、体现，如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赋税，以及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劝课农桑”是忽必烈安定民生、使民富裕的具体策略。成吉思汗进入中原后，曾将落后的奴隶制强加给内地，甚至提议毁农田作牧场。造成华北、中原地区经济的逆转和社会的动荡。忽必烈早已注意到“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劝课农桑对于安定民生、使民富裕的重要意义。于是，即位伊始，他便“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同时，他还命令各



地的宣抚司们注意选择通晓农事的人，委任其担任劝农官。1261年，忽必烈设立了劝农司，并发布诏书规定：“今后有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增添户口、差发办集，各道宣抚司关部申省，别加迁赏；如不能安集百姓、招诱逃户、比之上年户口减损、差发不办，定加罪黜。”忽必烈劝课农桑以富民的治国策略，使统一后满目疮痍的中国，逐步走向大治。“廩有余粟，帑有余财”。1273年，当时的著名学者王磐曾著文称道：“圣天子临御天下，欲使斯民生业富乐，而永无饥寒之忧，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同时，由于忽必烈抓住了安定民生、使民富裕这一治国的基础，也使他的社会改革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

“治国先富民”谋略要落到实处，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而且还需要各级官吏的贯彻。汉武帝时期，武帝一方面坚持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策略，另一方面，又注意严肃吏治。他把全国100多个郡划分为豫、冀、幽、并、兖、徐、青、扬、荆、益、凉、交趾、朔方13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史称“十三部刺史”。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辖州郡，年终回京向武帝汇报。刺史所察视的有6个方面，即“六条问”：一是强取豪夺，超出规定多占田地和住宅，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是二千石大官不奉诏令，不遵守国家法制，以权谋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是二千石大官不谨审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草菅人命，民愤极大，还谎报灾异的；四是二千石官员选拔人才时营私舞弊，推荐宠顽，强压贤士的；五是二千石官员子弟依仗老子权势胡作非为，事发后又托人情走后门的；六是二千石官员不尽心公职，阿附豪强，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的。吏治的省察保证了汉武帝“富民”策略的实行。后人称汉刺史的“六条问事”为“百代不易之良法”。事实确实如此，刺史六条对于保护民众的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